

I046/13

刘禾 著

跨语际实践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

（修订译本）

★

★

★

刘禾 著 宋伟杰等 译

跨语际实践

★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

（修订译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Copyright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刘禾著，宋伟杰
等译. -2版.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3

ISBN 978-7-108-02574-4

I. 跨… II. ①刘…②宋… III. ①英语-翻译理论②
文化语言学-研究 IV. H315.9②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8354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扉设计 罗 洪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3月北京第2版

2008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5.875

字 数 340千字

印 数 0,001- 6,000册

定 价 48.00元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1995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序

不同的语言之间是否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倘若如此,人们如何在不同的词语及其意义间建立并维持**虚拟的等值关系**(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在人们共同认可的等值关系的基础上,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譬如,倘若不使一种文化经验服从于(subjecting)另一种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翻译或者诠释,我们还能不能讨论——或者干脆闭口不谈——跨越东西方界限的“现代性”问题?这二者之间的界限是由谁确定和操纵的?这些界限是否易于跨越?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普遍的或者超越历史的立场上提出一些可信的比较范畴?

我在本书提出“**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概念,目的在于重新思考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文字的交往形式究竟有哪些可能性。虽然过去20年间,对后殖民性、文化、身份认同(identity)、自我与他者等问题的复杂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这些研究也充分表明,如果继续将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仅仅视为一种奢侈,或者仅仅视为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果所进行检讨的一部分,这将是不可思议的。后殖民理论家的著述发人深省,而且他们的研究方

法所开启的新思路使我们获益匪浅。与此同时,我认为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学的研究,也必须直面种种现象与问题,而这些现象和问题无法被简单归结为西方统治与本土抵抗这一后殖民研究范式。经常让人奇怪的、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是,恰恰在批判西方主导论这一行为当中,批评者最终却常常将统治者的权威僵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即,非西方文化的能动作用仅仅被简化为单一的可能性:抵抗。

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更好地处理这个基本问题呢?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精心阐述的混杂性(hybridity)一词,旨在通过消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使后殖民的研究趋向摆脱僵化的模式,从而能够把握各种复杂细微的差别。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家国之外(diasporic)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欧洲宗主国语言被殖民地本土方言所浸染而获得混杂性,这些方言又反过来讽刺了殖民者语言假定的完整性。巴巴酷爱援引的拉什迪(Salman Rushdie)笔下那个口吃的印度人西索迪亚(S. S. Sisodia),便精彩地道出了这一后殖民漫画像:“The trouble with the Engenglish is that their hiss hiss history happened overseas, so they dodo don't know what it means”(英国……国人的麻烦是,他们的隶……隶……历史发生在别处,所以他们不……不……不明白这历史的含义。Rushdie, p. 343)。但是我们不该忘记,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地区,欧洲宗主国语言并不通用,它们既不能与本土语言相匹敌,更无法获得国族语言或方言的地位。那么,关于历史、能动性、霸权、现代性以及主体性等问题,那里的人和地区的经验,又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

本书使我有机会把语言实践作为多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加以考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所,我们能以新的角度重新开启并追问东西方关系和现代性的意义。作为一名生长在大陆,从小读写汉语,直到“文革”之后才开始把英语作为外语运用的中国人,我深深被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所吸引,尤其是汉语和英语、现代日语以及其他外国语言发生接触以来,其书面形式的变化。在本书中,我将探讨汉语同欧洲语言和文学(通常是以日语为中介)之间广泛的接触/冲撞,特别关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直到抗日战争开始(1937 年)这一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及其早期的经典化过程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不过,我对语言和文学的强调,并没有预先假定在表述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形而上的分裂。我要做的就是将语言实践与文学实践放在中国现代经验的中心,尤其是放在险象环生的中西方关系的中心地位加以考察。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破土而出,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那么,这与其说是因为小说、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是自我表现的透明工具,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脉搏,不如说是因为阅读、书写以及其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人的国族建构及其关于“现代人”幻想的想像的(imaginary/imaginative)建构过程中,被视为一种强大的能动力。

我在本书开篇处将“现代性”一词置于引号当中,并非心血来潮。我的目的是让人们不要忘记已经发生过的种种引证。这些引证的来源(origins)在数不胜数的重复、复述(evocations)、翻译以及再生产中消失殆尽。当我们说“modernity”或者“modern”在汉语中的等义词是现代性或者现代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哪一时刻,在什么样的语境中,这种

等值关系或者翻译才有意义？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述行的/述愿的(performative/constative)叙事(比如说，经由特定情境的写作和言语而对某种观念不断地复述)往往构成思想史家所理解的观念的“连续性”。举例说来，翻译行为必然要介入现代语言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之中，而这种述行性限制着翻译行为的历史偶然性，同时也为翻译行为的历史偶然性所限制。对于诸如此类述行的/述愿的言语行为和写作行为(复述、翻译、语境内外的引证，等等)的环境而言，任何高高在上或者超越这些环境而进行的学术尝试，注定会导致所分析的观念、概念或者理论的僵化，其结果也必定会导致我们对历史实践理解上的贫困化。因此，我对“现代性”的使用或者批判立足于关注引用和翻译实践的研究取向。这一取向既考虑到关于现代性观念的早期探讨，也考虑到我本人当下对这个观念的关注；即使我在本书中不再使用引号，也是如此。简而言之，我是用这个被人们反复引用和翻译的观念、这个可引用的(?)和可以互译的(?)观念，来讨论中国现代性的话语建构。

就本书而言，我对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人们如何想像并谈论中国的现代状况？以及从这一问题必然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当某些类型的话语相对于其他话语而取得优势地位并得以合法化的时候，究竟造成了什么后果？我关注的重心并不是中国现代性的本土特性(the loc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modern)这一问题。倘若不充分研究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跨语际实践，本土性的问题就无法合理地进行探究或争论。当然，我并不认为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探讨现代性是惟一可取的途径，人们可以对中国现代性提出许多其他的问题。但就

本书而言,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不致陷入以往那种二元对立范式的罗网。那种预先限定了何为现代、何为传统的旧范式在许多有关东西方关系的当代历史写作中依旧阴魂不散。

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早已聚讼纷纭,广受质疑,而且本当如此。然而,仅仅因为它们是虚构的发明或人为的构造,就足以摒弃这一二元对立吗?我的观点是,更有效地解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方式,是要准确描述和分析特定的历史情景,也就是说,东西方二元对立观念在特定的语言中是如何开始具有语境的意义,并获得合法性。我之所以在本书中继续使用 East 与 West,是因为我希望提醒读者注意这两个英文词在现代汉语中作为“东方”与“西方”的翻译表现(performance)。对现代翻译进行这样的研究使我们能够质疑常识世界的**不证自明性**(皮埃尔·布尔迪厄语),而 20 世纪的中国人正是以东西方的逻辑命名他们自身与任何一种偶然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差异的,这些身份认同被他们理解为是在自身所处的时代之前就存在,或是被外界强加于身上。换言之,我们关注的是修辞策略、翻译、话语构成、命名实践、合法化过程、喻说(trope)以及叙事模式,因为自从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现代经验的历史条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我想至少有一点很清楚,本书所讨论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翻译行为,更不用提所谓的外国词语和话语的中国化问题。要想轻松自如地谈论中国化,必须充分假设中国人自信其文明相对于世界的其他地方具有绝对的中心性(centrality),而在我所考察的这段时间里,由于西方的在场,这种自信几乎消磨殆尽,其程度之深,甚至迫使中国人为了自身维系独立的身份认同,必须或隐或显地参照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榜样,后者时常

以西方为代表。那些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中立的和普遍化的课题,诸如外国词语在任何一种语言环境中的本土化过程(domestication),这是历史语言学家经常考虑的问题。我真正的理论兴趣在于中国文学话语中“现代”与“西方”的合法化过程,以及在这些符号意义介入的(mediated)合法化过程当中中国人的能动作用的暧昧性。因此,导言一章主要是批判地反思当代有关东方与西方、语言与权力、历史与变化的种种理论话语的状况。毋庸赘言,我借助跨语际实践的观念,重新处理比较文学、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中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第二至第九章分为三个部分,它们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分别考察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的不同层面。第一部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话语中“国族”与“个人”这两个主题之间的话语疆界。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两种特别突出的话语上:“国民性”理论与“个人主义”,两者都是新来的借贷词,来自日语对欧洲概念和理论的翻译。我认为,正是在这些被译介的理论和话语的范围内,以及在参与这些思想的过程中,五四作家提出了他们自己关于现代性的基本论点。

为了不使我的工作被误解为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式有限的关键词研究,我所研究的不仅是词语、概念以及话语的变化含义,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反映了更为广大的历史进程。由于我关注的焦点是汉语文学实践中“现代”的合法化过程,所以我也必然要思考跨语际的表述模式问题。举例说来,我对鲁迅《阿Q正传》的解读旨在理解这篇小说是如何通过挪用国民性话语去实现叙事的主体结构。这一研究取向在第二部分得以进一步强调,因为我提出如下的问题:中国的现代经验如何产生于文学表述的具体形塑(figures),如

叙事模式、小说现实主义、文体革新、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现代性的性别化喻说、内心世界的表述以及精神分析式象征主义的错位(transpositions)等。虽然大部分此类特征对中国文学来说显然是新颖的,并时常伴随着自封自命的与欧洲语言文学的亲 and 性,但仍旧存在许多其他特征,不能确凿无疑地回溯成外国影响的结果。举例说来,影响的观念所无法解释的那些剩余的意义是什么?有学者提供的似乎可行的诠释是,这些意义乃是转化成现代表达形式的传统感受力(sensibilities)。然而,一个随即产生的困境是,如何确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线。

在分析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这一类充满着中介因素的表述形式的时候,我一直抵制着如下一种诱惑,即要么用外国影响要么用本土演进来解释历史变迁,因为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过早地结束对问题的探讨,而实际上我们恰恰应当把它揭示出来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这个概念之所以有所助益,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识别并诠释历史偶然的时刻与过程,这些时刻与过程既无法归结为外国的影响,也不能简化为本土传统不证自明的逻辑。读者将会注意到,影响我对具体文学文本的选择与读解的正是跨文化诠释这一主导性的问题意识,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 canon 本身。

诚然,经典本身也需要质疑。第三部分“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继续思索能动性、中介与翻译的知识,但这一部分的探究方式是围绕经典的形成、文学批评以及其他文化建构的规划,来着手处理合法化问题的。具体说来,我审视民国时期现代文学批评的功能,并查考经典形成的环境,譬如 1935 至

1936 年间权威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过程。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现代中国文化如何**诠释自身**的发生和展开方式,以及文学规划如何被不同作家、批评家的政治志向所左右,尽管这些作家、批评家认为他们本身是在群策群力地解决自身存在的矛盾状况。也就是说,什么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取决于你如何回答什么不是中国人或中国文化。这一矛盾既推进也质疑了作家们提出的前所未有的宏图,即把中国文学与文化设想为世界上为数众多的民族国家文学与文化中的一员。本书的最后一章重新思考有关国粹作为一种文化建设话语的论战。晚清与民国时期这一话语变化的动力引发了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叙事和对抗性的话语,而这些叙事和话语无疑将会使我们对中国的国族文化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之意义的理解变得复杂起来。

目 录

序	1
---------	---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1
--------------------------	---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5

如何翻译差异——矛盾的修辞 14

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 27

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 35

历史变迁论:新词与话语史 38

I 国族与个人之间

第二章 国民性话语质疑	73
-------------------	----

国民性的神话 74

鲁迅与阿瑟·斯密思 77

翻译国民性 88

跨语际写作的主体:《阿Q正传》的叙述人 98

第三章 个人主义话语	110
------------------	-----

作为意义之源的主方语言 111

民国初年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辩 117

II 跨语际表述模式

第四章 “经济人”与小说写实主义问题…………… 137

解读《骆驼祥子》 141

第五章 欲望的叙事:关于现实与梦幻…………… 176

重构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178

魔幻如何被心理化 182

真实界的幻影 196

第六章 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208

屈折语形态中人称的指示功能 210

男性欲望和阶级叙事的指示功能 215

忏悔之音 228

女性的自我言说 238

III 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

第七章 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255

国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258

性别与批评 271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重读《生死场》 277

第八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 300

1930年代的出版业与激进主义文学 301

赵家璧与良友图书公司	308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	311
经典、理论与合法化	315
第九章 反思文化与国粹	334
关于《国粹学报》	337
关于《学衡》	343
附 录	360
A. 源自早期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及其流传途径	365
B. 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借贷词	379
C. 现代汉语的中—日借贷词	393
D. 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	
现代汉语中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	395
E. 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	422
F. 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汉语音译词	431
G. 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	452
文献目录	455
再版后记	494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严格地讲,旨在跨越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翻译而已。翻译,作为一种在认识论意义上穿越于不同界限的喻说(trope),总是通过一种事物来解说另一种事物,虽然它必须自称是出于“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出于“达”)的目的论来表述“真”。不过,倘若暂且不去讨论拉丁语系里的“信”和“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概念(这两个概念都受到解构主义的批评),那么关于翻译及其对于跨文化理解的意义,我们还能够知道什么或者说些什么呢?而且,如果当代学者试图跨越横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之间的“语言障碍”,那么对他们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诚然,这里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译体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语际相互作用。^[1]我在着手处理本书的主题之前,就已经觉察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些更大的问题,如西方学术界在思考文化差异时表现出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方式。举例来说,学术研究的学科界限以及我们习以为常的研究模式,在处理不同于自身的文化和语言时,常常造成一些困难重重的诠释问题。^[2]比如,

使用谁的术语,为了哪一种语言的使用者,而且以什么样的知识权威或思想权威的名义,人们才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之间从事翻译活动呢?当人们从西方跨向东方,或者从东方跨向西方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尤其尖锐了。毋庸置疑,如果这种研究的对象本身,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一个“未曾被污染”的本土知识的处女地,那么,这里所说的解释方面的困难就会更加严重。就曾经“污染”过中国语言和文学的那些历史力量而言,早在近现代时期它们就已经强制实现并且决定了我在上文所说的那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界限穿越,即强制实现并且决定了对西方的翻译以及现代汉语的发明。虽然我不敢擅称能够解答这些问题,但我将不揣冒昧地进入这些多层次的交叉与纵横的地带,描述并展开对这一主题的探索。^[3]

也许,把我的总论题(problematic)重新放置在一个略微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会更有助于理解它的意义。这里我要简短地介绍一下人类学家已经展开的关于“文化翻译”之观念的论辩,我相信这场论辩对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以及人文学科中的其他学科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多年以来,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为了提出新的阐释方法,已经在其理论阐述的不同阶段使用了“文化翻译”的概念。他们的理想是,这一概念能够解释他们自身的文化和他们所研究的非欧洲社会之间的差异。譬如埃德蒙·里奇(Edmund Leach)是这样描述民族志研究中这个典型的转折点的:

让我扼要重述一遍。我们是从强调“他者”如何跟我们不同开始的——这不仅使他们显得与我们截然不